



# 苏联解体前后

俞邃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苏联解体前后

俞邃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苏联解体前后  
编 著 者 俞 邃  
责任编辑 彭晓路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页 7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351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473-4/D·242  
定 价 17.8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8.19事件后从外地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



反对解散苏联的群众集会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冉冉降落



俄罗斯国旗——三色旗在克里姆林宫升起



戈尔巴乔夫挽救苏联的幻梦破灭



8.19事件中  
人民群众在红场拉着大幅三色旗——  
俄罗斯国旗作为屏障



8.19事件中人民  
群众阻拦坦克

戈尔巴乔夫与美国  
总统布什



——议会所在地  
1993年「十月事件」中被炮轰的白宫



叶利钦就1993年事件责问戈尔巴乔夫

## 序 言

本书是著名的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撰写的论述苏联解体前后的变化和形势新发展的一部文集。涵盖的时间大致从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

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最初几年,是个不平常的年代。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这个变化在国际上的直接影响,是战后维持了四十多年的雅尔塔体制宣告解体,两极格局最后终结。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影响,是传统的苏联模式宣告破产,把苏联奉为唯一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此终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苏联国内来说,苏联解体为各新独立国家造成了巨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新独立各国正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探索符合自己民族国家利益的新模式、新道路。

苏联的剧变和它在国际上和苏联国内引起的重大变化,把一系列新的问题提到关心世界和平前景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面前。这些问题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将如何变化?世界主要矛盾会有什么变化?苏联发生变化的原因何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究竟将如何?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特别是在联合国继承前苏联地位的俄罗斯,今后趋向究竟怎样?独联体今后的命运又将如何?

俞邃同志在本书中的论述,正是对以上问题的回答。



2PB/02

这些问题,虽然在我国理论界、国际问题研究界、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界,已有不少文章加以论述,但俞邃的这个文集却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这个文集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作为长期从事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作者必须不断追踪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因而在这个文集中,很自然地留下了他辛勤劳作,长期对苏联、对国际问题追踪研究的轨迹,显示出在各个方面研究上的连续性、系统性。在这个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戈尔巴乔夫从上台执政直到苏联解体这六年多期间各方面问题的分析和评论;可以看到对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新特点的连续性的研究和评论;可以看到对俄罗斯形势以及独联体问题和前景的连续研究和评论;最后,还可以看到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多角度的思考,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的分析和评论。正是这种长期的持续的追踪和研究,使作者具备了研究苏联和国际问题所必需的深厚功底,同时使研究的问题都能做到言必有据。

其次,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的评论上,显示出作者对国际问题观察的敏锐性、创新性,同时又比较全面和实际。比如,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评论,当这个思想初见于报刊时,作者在指出其一定的积极方面的同时,就强调指出了这个思想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它的宣传性和可疑性,应说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问题上,作者在分析了冷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矛盾突出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加深的形势之后指出:在苏联解体后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同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必然上升到首位,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摆脱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主要矛盾的教条,而从客观实际存在的矛盾出发来观察国际形势的观点,既创新,又实际,是很可贵的。在世界格局变

化问题上,针对那种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不确定因素过多,难于对当前世界格局提出某些明确看法的观点,作者提出,两极格局终结两年多来,虽处在向多极化过渡的转折时期,但“一超多强”的政治多极的局面已变得更为明朗,那种世界格局的“不可知论”是不可取的。在独联体的发展趋势问题上,作者在其形成伊始面临生存危机之际,便在对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内在深刻联系的分析基础上,指出独联体的矛盾与协作并存,经过艰难的过程有可能保持下去。在俄罗斯局势如何看待的问题上,针对过高估计俄罗斯当前困难的观点,作者提出,对俄罗斯的潜力、后劲,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对俄罗斯的复兴,宁可估计得早一些、快一些,这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观察问题,显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气概,是颇有见地的。

再次,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中,提出一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借鉴意义的论点。作者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改革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其中特别强调了戈尔巴乔夫放弃和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认为这是造成全国大乱的核心问题。作者列举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历史原因,其中强调了苏共发生蜕变,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人民拥戴的这个根本问题;还指出,经济没搞好,人民生活提高缓慢,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站不住。此外,作者还强调了苏共领导忽视了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对西方渗透缺乏警惕,70年代同西方扩大交流,西方观念得以自由输入,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已在悄悄发生演变。这样来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就把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更突出出来。作者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路线得以实施,是同历史遗留积弊及其消极影响有密切关系的,揭示出戈氏的错误路线得以推行的历史原因,这样的见解是深刻的。

最后,作者以对苏东国家剧变后的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为依据,表达了社会主义经过曲折道路,最后必然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念。作者强调,苏东剧变主要是传统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出了问题,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出了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原苏东国家仍然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怀念日增,中左力量呈上升趋势。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和组织,在新形势下,越来越自觉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作者指出,在剧变发生的最初几年,许多党的口号变了,社会主义字眼少了,但这是否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还要作具体分析。重要的是看发展和结果。对于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的成效,固然不应抱盲目乐观态度,但悲观主义也是没有根据的。作者认为,不能以是否回到苏联模式来判断是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模式多种多样,但从长远看,最富有生命力的应是“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者对新形势下原苏东国家一些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的探索进行分析,总结出多种模式的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有生命力的这一结论,这就展示了社会主义虽经历曲折道路而必将胜利的前景。

以上只是粗略列举这本文集的主要特色和所论述的几点主要内容。仅从这些内容,已可看出这本文集所论述问题的广泛性、现实性以及这些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这本文集之前,作者已经出版过一本题为《莫斯科的冬与春——一个时代的终结》的专著,是专写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得到了读者的好评。我相信,这个文集以它密切联系现实的丰富内容和流畅犀利的文笔,一定会使读者开卷有益。

**刘克明**

1994年7月1日于北京

## 作者前言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这个曾经在 22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后来又成为综合国力几乎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终于在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改革过程中，在和平的条件下，一步步地走向了崩溃。前苏联的 15 个成员国在获得独立之后各奔前程，面临的却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道路，经济无不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一个被称作“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实体”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从一开始便是矛盾与协作交织，在艰难中苦苦煎熬。各国领导人在别无更佳选择的境况下，逐渐取得共识，将克服自身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加强独联体的协作（特别是经济合作）上面，于是独联体的作用有所加强，趋于相对稳定，其发展前景变得越来越微妙。总之，苏联的存在，苏联的解体，前苏联大地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始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笔者从 50 年代后期起，便从事国际问题和苏联问题的研究，是二战后苏联发起的几次改革，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与动乱的目击者和研究者。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 6 年又 9 个半月时间里，因工作关系，几乎每年都要去苏联访问考察。1986 年 5 月至翌年初，还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苏联改革之初的设计蓝图和政策形成进行了实地了解。在戈氏政权风雨飘

摇的岁月，几度亲临观察，1991年5月曾随同江泽民总书记出访苏联，并一睹那位既充满自信却又一筹莫展的传奇人物之“风采”。总之，这个时期苏联改革的每个阶段，每个重大举措，每个新“理论”，笔者都比较及时地在各种刊物上，在讲坛上，留下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便构成了出版本文集的基础条件。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主要选编了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经过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直至1994年年中，笔者在这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将近10年中的部分文章和言论。全书由上篇（苏联解体以后）和下篇（从戈尔巴乔夫上台至苏联解体）两个部分组成。上篇包括苏联解体以后的22篇文章和言论，下篇包括自戈尔巴乔夫上台至苏联解体的22篇文章和言论。文集内容力求保留原貌，即使今天看来有的提法不一定合适，在编书过程中亦不予改动，必要时加一注释。例如，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初，笔者曾经强调指出改革的艰难性和风险性，同时也提出这一回的改革与苏联前两次改革的条件发生某些变化，因此，尽管存在失败和成功的两种可能性，我们还是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苏联改革可能成功的方面。这是当时的真实思想，今天也无须回避。这样提出问题的原因，是想说明苏联改革系人心所向，具备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基本条件；同时，苏联走上改革道路之后形势逼人，希望我们加强对自己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紧迫感。当然，苏联的改革毕竟以失败而告终了。再者，笔者曾多次指出国际共运虽处于低潮，但具有美好的未来。这个论断同苏联和东欧剧变的严酷现实似乎不协调，但笔者并不后悔，因为道理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有待时间来证实罢了。此外，由于有些报告和讲话当时没有全文公开发表，其中有些部分曾写成文章在刊物上与读者见过面，所以这次将报告和讲话收进文集时，为避免重复，作了适当的必要的删节，注明是“摘要”或“要点”。文集的内容以苏联问题为主，也有若干篇是探讨与

苏联有关的整个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和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苏联问题中，又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理论等诸多方面。鉴于这个情况，文集的编排不便按内容分类，故以时间先后为序。有两篇是与友人合作的，在注释中分别加有说明。

在选编这部文集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在我研究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几十年过程中的三位导师：赵毅敏同志、李一氓同志和宦乡同志。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教育家赵毅敏同志，是我走上国际问题研究之路的启蒙导师。1958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举办的理论性和报道性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在布拉格创刊，毅敏同志作为中共代表担任编委，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一起在国外相处四年多（回国后又有几年继续在赵老手下工作）。赵老20年代就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新中国诞生后长期主管外事工作，他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共运活动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布拉格期间，他结合讨论编辑部的工作乃至来自各党的每篇文章，时时刻刻对我言传身教，指导我洞察和研究国际问题的方法，教会我掌握处理兄弟党（当时是这样表述的）关系的原则，特别是经常对苏共和苏联进行精辟的分析。杂志的内容和杂志编辑部的活动涉及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中与苏联有关的事情占很大比重。我们又整天同苏联人打交道。因此，那些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使我增加和积累了对苏共和苏联的认识。

从1975年至1990年，我一直在李一氓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给我许许多多的亲切指点和帮助。他常对我说，研究苏联问题要从该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把握全貌，要了解它的历史，要有发展的眼光，又要把苏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

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我写的一些文章，有时我向他口头陈述，在这种时候，我见他总是端着烟斗，幽默地微笑着，耐心听我的说明。他对我那些年以“啸楼”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文章非常关心，多次促膝评说。其中对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前夕发表的长文《江河日下的五年》，谈论兴致更浓。1982年3月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评意共和苏共的论战》，便是一氓同志亲自交代我撰写并由他定稿的。使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1981年初，他提出，应该将我国“文革”以后几年来苏联出版的反华书籍集中一下，看看那里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他指定由我负责，带领一些同志，用去半年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找到68册书，编成了一本10万余字的《苏联反华著作简介和论点提要（1977—1980）》。从编选原则、体例直至封面设计和字型选择，都是经一氓同志反复斟酌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他还利用在青岛休息的时间，写了一篇极富特色、别具风格的前言，注明时间是1981年8月18日。一氓同志对我个人的厚爱，更是寄予殷切期望。他的著作《一氓题跋》、《花间集校》等，都曾亲笔题字赠给我。1982年上半年机构调整，他曾找我谈话，领导上打算让我担负更重的工作。我向他表白了想把精力主要用于研究方面的意愿，并在《北京晚报》“百家言”栏中撰文《李典的风格》以明志（据《三国志》记载，名将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自认为“弩怯功微，而爵宠过厚”），对此一氓同志大为欣喜。1989年秋，一家出版社曾打算将我有关苏联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一氓同志欣然题写了书名：《苏联——今天与昨天》。鉴于种种缘故，那本书当时未能问世。尊敬的李老于1990年12月与世长辞，而苏联亦于1991年12月消失了。

宦乡同志，这位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资深外交家，是我的又一位导师。我很早就仰慕他，但直接受到他的教益，却是80年代的事情。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转任国务

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之后，我同他的接触增多了。那是个新建单位需要人，而我也颇想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从事研究，所以他曾几经努力，想把我商调过去。遗憾的是，鉴于诸多原因，直到他1989年2月谢世，这件事终未办成。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中联部领导允许，可以协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些事情，因而有较多机会当面聆听宦老的教诲，并荣幸地被聘为该单位的特约研究员。使我深受感动、终身难忘的是，1987年初，我因病从国外归来，宦老到我家来看望。他向我谈了他对今后国际问题调研的部署，分析了当时国际问题领域的各种倾向，还讲到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使我获益极大。本文集收进的《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性质问题》、《苏联社会政治生活面临重大变革》等文，就是遵照宦老的嘱咐写成，首先在他主管的刊物上发表的。由宦乡同志主编，1989年4月问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一书，宦老选定我为作者之一。写作酝酿过程中，宦老领着诸位作者（其中有何方教授、厉以宁教授）多次共同商讨，每一回都使我感到如入博大精深的知识之宫，有学不尽的新鲜东西。宦老在病重之际还审阅了我的稿子。宦老对我的器重和期望，是我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不敢稍有懈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本文集得以问世，承蒙许多同志和朋友的关怀和支持。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霞林同志，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钱协寅同志，省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秦志法同志，《扬子晚报》副总编辑俞适同志，都给予了真切的关心。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前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建邦同志，是出版这本书的热心组织者。江苏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使本书与读者见面方才有了可能。我的老领导、新中国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教授，75岁高龄，不顾溽暑，挥汗为本书作序。《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姚东桥同志为本



书的装帧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本文集一定程度上是苏联演化、兴衰的一个缩影。如果它能够给读者带来兴趣、知识和启迪，那将是我的最大满足。一家之言，错误和疏漏之处恐不会少。我衷心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俞 邃**

1994年夏于北京芙蓉里